

江苏省金融学会第二届年会
钱币学术首次讨论会
论文选

一九八三年



江苏省金融学会

一九八三年五月

430475



江苏省金融学会第二届年会
钱币学术首次讨论会论文选

一九八三年



江苏省金融学会

一九八三年五月

目 录

运用辩证法来研究银行的改革·····	黄如之 (1)
为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奋斗	
——学习十二大报告的一点体会·····	许纯观 (9)
试论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王子猷 (22)
研究国外经验教训 严格控制投资规模·····	李 震 (29)
固定资产投资平衡问题初探·····	金玉媛 (40)
浅谈银行怎样支持企业走内涵道路问题·····	卫开文 (49)
略谈做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	陈学询 (53)
试谈关于利用外资问题·····	蔡善祯 (55)
当前利用外资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邹恩荣 (63)
论新时期的银行信贷监督·····	彭兆庆 (68)
必须进一步完善农村信贷管理体制·····	林幼群 (76)
谈谈如何放好外汇贷款工作·····	高中庸 (82)
对改革工业流动资金贷款办法的探讨·····	宋柏年 (88)
改革施工企业资金管理办法刍议·····	姜璜祥 (95)
试论施工企业资金供应等项管理制度的改革·····	
·····	王绍琪 (100)
浅谈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问题·····	范毓红 (105)
按“销资率”贷款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	
·····	镇江市人行 (112)
关于提高外资贷款经济效益的探讨·····	
·····	无锡中行信贷科 (120)

浅谈基层外贸信贷的经济效益问题·····	张建萍 (127)
实行差别利率 提高经济效益·····	庄根明 (133)
谈谈外汇贷款的利率问题·····	何培煜 (138)
加速出口收汇 提高经济效益·····	邱根泉 (142)
积极提高保险工作的经济效益·····	李继明 (150)
试论保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张四维 (160)
浅谈社队企业贷款偿还性问题·····	
····· 大丰县支行农金研究小组 (165)	
商业信用必须适当控制·····	李日恒 (172)
现金管理应进行必要的改革·····	
····· 丁秉奎 陈 桢 季长年 (177)	
实行信贷工作责任制的初探·····	雍嘉禄 陆献仕 (183)
投资效果包干浅议·····	曹致德 (187)
论农村信用社实行岗位责任制问题·····	范金良 (191)
谈谈银行的会计监督与稽核监督·····	杨时增 (197)
大型企业组织“内部银行”浅议·····	
····· 康光鲁 季长佑 董胜利 (203)	
扩大工业品下乡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钟瑞煌 (209)
论新形势下的人民币面额·····	周义宝 (215)
对当前市场货币量的一些看法·····	叶照贵 (223)
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分析与估计·····	刘明康 (229)
做好侨汇工作 支援四化建设·····	张忠如 (234)
开创农村金融工作的新局面·····	陈庆林 (239)
关于试办农村自然资源开发性贷款问题·····	张 展 (248)
基层单位开展经济信息活动问题的探讨·····	毛兴元 (255)
把基层行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	

——学习十二大报告的一点体会·····	
·····	良 恒 姚 鸣 (263)
钱币学与“两个文明”建设刍议···	王翼洲 汤可可 (269)
死物活用 支援四化·····	翁惠成 孙国宝 (275)
古钱币概说·····	金 琦 (280)
弧足空首布初探·····	徐治亚 (291)
至元通宝钱质疑·····	马大骏 (296)
关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币资料的探讨·····	金 诚 (297)
浅谈货币陈列的艺术处理·····	
·····	泰州市博物馆、泰州市钱币学会 (307)
钱币知识·····	宝应县钱币研究筹备小组 (312)
第二次年会讨论的几个金融理论问题·····	
·····	朱裕昆、李炳生 (318)
1983年江苏省金融学会第二届年会交流文章目录···	(324)
江苏省第一次钱币学术讨论会交流文章及资料目录	
·····	(331)

运用辩证法来研究银行的改革

黄如之

现在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改革的喜雨洒遍了中华沃野。一个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农业发展到商业、工业、交通运输，从经济领域发展到科技、教育、文艺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正在全面而系统地展开。改革的潮流，势不可挡。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银行是联结国民经济的纽带，是社会资金活动的枢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骨干。国民经济各部门都在改革，银行也要改革，不改革就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新局面，才能创造新经验，才能较快地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才能。因此，必须把改革放在突出地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但是，改革要有正确的思想做指导，指导思想正确与否，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我们研究改革，也必须要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否则，也是出不了好的科研成果的。

那么，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指导思想呢？什么又是研究改革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呢？归纳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最完整、最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党中央提出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

改。”这三句话，实质上就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譬如说，要从实际出发，那就必须运用辩证法，因为实际事物是全面的、矛盾的、发展的。我们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就必须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各方面去考察，才能防止主观主义，避免形而上学，才能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我们研究银行改革问题时，也要遵守这个规律，要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研究改革中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才能做到对不同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在研究银行改革的问题时，我认为以下几对矛盾要认真研究。

一、银行要适应改革、促进改革和勇于自身的改革。银行是国民经济的管理部门，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服务的，现在农村、城市、各行各业都在改革，改革以后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对银行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譬如农业的改革，使整个农村经济面临着从自给、半自给生产趋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由传统农业趋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过程之中；商业的改革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少环节，城乡通开，商品流畅的新形势；工业的改革，出现了承包、租赁等形式，核算单位增加了，工资支付形式改变了；市管县的新体制，使城乡经济的结合更紧密，形成了新的经济网络等等。这些都大大地影响了金融，使货币流通和信贷活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银行工作必须首先适应改革，适应这些变化了的生产方式，在开户、结算、付现、工资奖金管理、信贷以及保险业务等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改革；

在机构、人员的规模上也要与之相适应，金融体系的组织更要跟上。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要奖“勤”罚“懒”，对那些习惯于吃“大锅饭”的人就生怕砸掉“铁饭碗”，或犹豫观望，或裹足不前，作为国民经济综合部门的银行，就得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经济手段，奖励那些勇于改革卓著成效者，惩罚那些经营管理不善而又不图改革者，发挥银行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在整个改革中银行既然处在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要考虑的应是适应改革和促进改革，跟上整个社会改革的步伐。当然银行本身也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改革，也要勇于自身的改革。银行只有勇于自身的改革，才能适应与促进社会的改革。而适应和促进改革，又推动着银行自身的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二、既要掌握改革的重点，又要照顾一般的改革。

各行各业都有改革的任务，但是侧重点不同。银行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银行是管理货币与信用的，有它特殊的职能和作用。其重点是由银行改革的方向决定的。银行改革的方向又是什么呢？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所以银行改革的重点应是货币制度和信贷制度，要改货币的自流发行为限额发行，保证货币的稳定；改信贷的供给制为以销定贷制，发挥杠杆作用。在紧紧掌握这个重点的同时，也要兼顾一般的改革，如改革银行内部的管理制度、干部制度和工资制度等等。

三、国家统一改与地区分别改要同时进行。银行系统从中央到地方是一个整体，有些重要制度如货币发行制度、信贷计划管理制度、利率、全国范围的异地结算方式的制定等

等，要由国家统一改，决不能各自为政；但是，在不违背国家统一改的前提下，省分行和市、县支行在地区范围内也可进行一些改革，如按销售资金率掌握贷款，简化设备贷款的审批手续，建立稽核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在本省范围内开办票汇和期票及贴现业务，改革同城结算方式和集中进行票据交换，以及信用社的体制，保险公司依靠社会力量开展分保业务、代理业务等等，只要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利，看准了的就要坚决改，不要两眼向上，等待观望。

四、摆正总结自己的经验与借鉴外国模式的关系。银行的改革，借鉴外国经验是重要的。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我们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银行体制，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总结自己的经验。我国银行有开国以来三十四年的经验，还有解放前各革命根据地银行工作的经验，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系统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形成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一套观点和办法，用来指导改革。譬如单独建立中央银行问题，中国的国情和外国不同，有无必要？人、农两行历史上曾几分几合，到底哪种为好，应该认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银行已进行了不少改革，有的是成功的，有的不一定成功或者争论较多，认识不一致。譬如人民银行的信贷计划差额包干制度，农业银行的农工商信贷大包干制度，利率的改革，人、农两行的垂直领导制度等等，从客观规律的要求和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主要任务来考察，到底是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呢？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准标，不能只从一个角度或凭自己

的主观臆想来推断。

五、领导机关的决策要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如何进行改革，总是由领导机关和当权者来决定。领导机关了解情况比较全面，掌握材料比较充分，对改革的设想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革命是千千万万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领导机关必须尊重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对于群众的改革实践，对于群众的建议，对于专家的意见，领导机关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总结、听取和分析比较，决不能漠然视之，轻视群众的创造，鄙薄群众的意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领导机关决定改革方案时，要采取民主和科学的态度，集中群众和专家的意见，进行可行性研究，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实行改革。

六、要正确处理搞活金融与加强管理的关系。银行要适应改革后新形势的要求，对老一套的业务做法要采取一些灵活和变通的办法，放宽政策，搞活金融。但是，银行作为国民经济的调节机构，作为社会的簿记与统计机关，在放宽政策的同时，又必须加强管理和监督。因为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如果放松银行的管理和监督，就不能防止经济上某些资本主义自由化倾向的发生，不能有效地防止经济犯罪活动和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不能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譬如对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承包经营企业，既要放宽政策，在开户、信贷、结算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又要加强管理和监督，防止发生违法行为；为了适应多种形式和多种流通渠道的需要，既要采取灵活多样的结算方式，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同时又要加强结算监督和管理，加速结算资金的周转；对于有利于搞活经济和处理积压商品等情况，既要适当

开放一些商业信用,同时也要加强引导和管理,防止信用膨胀和冲击国家计划。应该明确,搞活金融是灵活措施,加强管理才是根本的方针。

七、贷富和贷贫不能偏废。为了发展商品生产,银行大力支持重点户、专业户,这是对的。但是,我国农村还有不少的贫困户,而扶持贫困户也是国家的重要政策,因此,银行也得重视对贫困户的贷款工作。当然这种贷款不是救济性质的,而是帮助和支持贫困户发展生产,摆脱贫困,使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因为我们工作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的信贷工作不能置贫困户于不顾。贷富与贷贫不能偏废。光强调一面,政策就不完整了。

八、利率政策和银行利润要兼顾。社会主义的利息是国民收入的转化形态,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工具。银行利率的提高、降低和浮动,要兼顾银行、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利率的变动,直接影响着银行利润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比例既已定案的情况下,既要重视发挥利息的杠杆的作用,又要注意不影响银行的利润收入,两者需要兼顾。

九、要解决利润分成与执行政策的矛盾。银行是管理经济的部门,不能在工作上追逐利润。工农商企业利润的增加,是从扩大生产、扩大销售和降低成本、节约费用各方面取得的,它意味着经济效益的提高。而银行利润的增加,并不是经济效益的提高,却往往是社会经济效益下降的表现。如企业经营管理越是不好,过期贷款和积压物资贷款就越多,则银行的利息收入也就越多;社会资金周转加速了,国家要鼓励发展的事业发展了,则银行的利润收入就越少;

基层银行储蓄搞得越少，信贷借差就越大，则利润又越多。可以说，银行执行政策与增加利润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基层银行决不能包利润。利润分成办法只能在总行和分行一级实行，不可以推到支行，以避免发生弊端。

十、权责利要结合，三者利益要兼顾。银行能否实行以承包为中心的权、责、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经营责任制，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但是银行改革的侧重点不在这方面，不要把改革的注意力倾注到这方面来。搞承包责任制，要根据银行的特点，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抄照搬物质生产部门的做法。首先不能包利润，但是银行无论实行什么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必须坚持权、责、利相结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首先要承担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在这个前提下给权给利。在三者利益安排上也只能是国家得大头，企业得小头，个人得零头，工资奖金增加的比例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例。要奖勤罚懒，按劳分配，工资奖金的发放不能搞平均主义。

十一、对工资奖金的管理，总额要有限度，个人不封顶。经营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对工资奖金如何管理？银行要控制总额，个人消费基金一定要有限度。否则超过计划，就会破坏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合理比例，影响财政平衡和货币流通，破坏市场供应的平衡，使国家长期发展得不到保证，社会经济生活难以稳定，对个人收入来说却不能封顶。这样才能做到多劳多得，有利于鼓励劳动者多增产、多贡献。实际上，只要劳动定额是平均先进的，工资奖金的标准是合理的，超过定额部分也就是有限度的，在客观上就受到了限制。

十二、物质鼓励和共产主义教育必须结合。改革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把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和他们的劳动成果结合起来，才能鼓励和刺激人们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积极做好工作。但是，在贯彻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教育，教育人们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团结互助，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各尽所能地为四化多做贡献。我们一定要防止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一切“向钱看”的利己主义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只有把物质鼓励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持久地坚持下去。

总之，对待银行的改革，态度要积极，步骤要稳妥，既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又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把改革看得很神秘而裹足不前，又不能看得很简单而草率从事。看准了的事情就要下决心干，看不准的要组织调查，进行典型试验，总结经验，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路子。决不能一哄而起，一刀切，一阵风，急躁冒进，要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前进。

为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 的根本好转而奋斗

——学习十二大报告的一点体会

人民银行苏州市支行 许纯现

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求从1983年到1987年五年内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做到显著提高经济效益，巩固地保持财政基本平衡，信贷基本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这是一项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需要全党重视，各部门共同努力，并把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才能实现“二平一稳”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现结合学习十二大报告的一些体会，对争取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问题，谈一些认识与体会。

一、稳定的经济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先后采取了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职工工资，广开门路安排就业和压缩建设规模等一系列发展生产、调整比例关系的措施，有步骤地进行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使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近四

年的时间里，国民经济朝着健康、正确的轨道稳步前进。1981年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赤字约25.5亿元，比1979、1980年连续赤字一百几十亿元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1982年预计财政收入1107亿元，收入开始回升，扭转了财政三年徘徊的局面，这是一个带有转折性的变化，经济也逐步趋向稳定。1981年国民收入比1978年增加87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290亿元，三年平均递增8.8%。这一年的国民收入分配，大体上国家集中的国民收入由78年的38%下降为27%，劳动者收入提高较快，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由1978年的48%上升到57%，企业也掌握了12%以上的财力，大大地改变了78年的38:9:48的比例关系。但也反映了国家通过财政集中的部分是少了一些。1981年国家所得部分如果扣除银行利息收入，国家财政从生产企业取得的初次分配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24.4%，比1978年的36%下降11.6%。在劳动者个人收入和企业收入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国家所得却逐年下降，主要是国家财政从生产企业集中的国民收入下降。特别是在前几年为了调整比例的失调，解决欠帐过多的问题，1979年财政赤字171亿元，1980年127亿元。由于连续几年发生巨额赤字，不仅动用了一部分国家后备力量，而且还大量向银行透支。1979年到1981年财政向银行透支和借支247亿元，以弥补财政的亏空，迫使银行增发了财政性的货币发行。1979年到1981年共增发货币180多亿元，使市场流通中货币量偏多了一些，影响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如果财政再发生赤字，银行只能靠发票子来弥补，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过多的货币发行，势必使市场货币流通量超过商品流通的需要，引起物价的上涨，影响经济的稳定，这是我们当前财政经济潜在的危

险，必须力求避免。历史的教训不能重演，那种基建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其结果是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矛盾转嫁给人民，受害者还是群众，势必影响安定团结的局面。陈云同志早在1957年就指出：“国家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财力、物力相适应，能否适应，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为防止经济建设超过国力的危险，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节余。”陈云同志这些对“三平”理论的论断，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平衡和物价的基本稳定的方针，坚持稳定通货和稳定的经济政策，坚持在计划经济指导下的经济性的货币发行，才能保证市场货币流通正常，物价稳定，这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

二、当前在经济建设中影响经济效益和财政经济状况的主要情况及其原因。

十二大报告指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而要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这个前提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过去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建设之所以未能取得同我们付出的代价相应的成绩，症结就在于经济效益太差。今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否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取得更大的进展，特别在五年内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其关键也取决于我们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及其取得成效的大小。当前，各方面虽然开始重视了经济效益，情况有所好转，但与历史时期较好的年份相比，无论在生产建设、流通领域各方面，经济效益还不够理想。其主要表现是：

1. 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近两年每一工业劳动者创造的净产值年平均只增长 3%，大大低于“一五”时期每年增长 16.9% 的速度。1980 年每一社会劳动者平均的国民收入只有 880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五五”期间平均每年只增长 3.5%，慢于“一五”时期 6.3% 的速度。

2. 物资消耗增大。每百元社会总产品的物资消耗，“五五”期间平均为 56 元，比“一五”时期 44.3 元增加 26%。每吨能源（折算标准煤 7000 大卡）生产的国民收入，“五五”期间平均为 529 元，比“一五”时期的 1167 元降低 55%。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不仅高于工业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的国家。从我国历史资料来看，相当于每吨标准煤的消费的国民收入。按 1970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1953 年是 1373 元，“一五”期间平均为 1167 元，而自 1976 年以来，一直在五、六百之间，即如 1981 年也只有 576 元，仍不到“一五”期间的一半。1981 年全年的能耗 6 亿吨标准煤，如果与每吨能源相当的国民收入增加到“一五”期间的水平，仅此就可以增加 3500 亿元，相当于 1981 年一年的国民收入。

3. 基建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差，固定资产的利用效果降低。1978 年在建工程达 700 亿元，按照“一五”时期每百元基建投资增加固定资产 80 元计算，超过合理界线的在建工程 400 多亿元。1979 年以后虽然抓调整，压缩了基建规模，减少了项目，但压了预算内的又上了预算外的，压了计划内的又冒出计划外的工程，财力与物力仍然失去平衡。在固定资产的利用效果方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提供的工业总产值，“五五”时期平均为 101 元，比“一五”时期平均 140 元降低了 28%。